

辽代砖塔

陈伯超 赵兵兵 马鹏飞 王南 著

华中科技大学

<http://www.hust.edu.cn>

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7YJAZH127)

辽宁省教育厅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JW201615414)

辽代砖塔

陈伯超 赵兵兵 马鹏飞 王 南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内 容 提 要

辽代砖塔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技术价值。本书从建筑艺术和营造技术的角度,系统地介绍和解析了辽代砖塔的建筑特点及发展演变过程。

本书分为辽代砖塔的建筑艺术和辽代砖塔的营造技术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介绍辽塔概况、辽塔的平面布局体系、辽塔的造型艺术、辽塔的装饰艺术等;下篇主要介绍辽塔的施工方式及工艺、辽塔的建筑材料、辽塔的构造做法、辽塔与其他时期砖塔营造特点的比较等。本书旨在使读者对辽代砖塔的特点及其演变过程有一个完整而具体的了解。

本书可供建筑学、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等专业人员阅读,也可供考古、宗教、旅游、工艺美术等专业人员及广大读者阅读和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代砖塔/陈伯超等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680-4047-1

I. ①辽… II. ①陈… III. ①砖结构—古塔—建筑艺术—研究—中国—辽代 IV. ①TU-092.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8584 号

辽代砖塔

LiaoDai ZhuanTa

陈伯超 赵兵兵 马鹏飞 王 南 著

策划编辑:简晓思

责任编辑:简晓思

封面设计:原色设计

责任校对:马燕红

责任监印:朱 玢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录 排:武汉正风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武汉科源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5.75

字 数:309 千字

版 次:201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5.00 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唐代之后,中国进入了宋、辽、西夏多民族政权并列的时期。由契丹族建立的辽占据着北部地区,今东北、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皆为当时辽所辖。辽实行“五京制”,立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东镇)为上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南)为南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为东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为中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为西京。因此,辽代建筑遗存多分布在这些地区。

辽与同时期的北宋既交往频繁又征战不断,这使得辽代建筑与宋代建筑之间互有影响,也有所差异。辽代建筑更多地继承了唐代建筑的风貌与技术,特别是北方晚唐建筑的特点。而宋代建筑接受中国南方文化的影响较多,在唐代建筑的基础上体现出偏向装饰与秀丽的发展趋向。此外,辽代建筑亦受到当地客观条件、文化习俗等的影响和制约,沿袭着当地建筑的传统做法,体现出地域性的特点,而与南部地区的建筑有所不同。在梁思成和刘敦桢共同发表的论文《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也曾指出了这一点:“燕云一带可能具有地方做法。”

北宋中期,女真族崛起并兴盛起来,于1115年建立了金朝,又在10年之后灭了辽,12年之后灭了北宋。于是宋室南迁,建立了南宋。自此形成了南宋与金、西夏相互对峙的局面。金代建筑则更多地吸纳了宋代建筑的做法,也与辽代建筑稍有不同。

辽代建筑遗存最多的要数塔和陵墓。特别是辽塔,代表着中国塔发展的高峰。现存辽代木塔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代表——应县木塔却被认为是中国塔最高成就的典范。而大量保留下来的辽代砖塔,更是体系完整,其以仿木作为艺术表现与构造技术的前提,形成了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方特征。

辽塔按建筑材料可以分成三类,即砖塔、木塔和砖木塔;按形式也可以分成三类,即密檐式塔、楼阁式塔和华塔。目前,我国现存辽塔约100余座,它们大部分为密檐式砖塔。

辽代砖塔的体量庞大、壮观,既承袭了唐代建筑雄伟大势的风格,又流露出北方民族豪爽的气势。辽代砖塔的平面多呈八边形,塔基宏大,塔身收分有度、比例得当,密檐多为13层,由修长的刹杆与重重相轮、宝珠组合成的塔刹作为砖塔的收头,塔的整体造型美观而有气度。辽代砖塔的结构合理,建筑构造与建造方式都明



显体现出模数和标准化的理念,是科学与审美的共同结晶;辽代砖塔的装饰精美,以砖仿木的样式独到,各类斗拱形态丰富,辽式斜拱更被广泛采用,砖砌、雕刻、饰件等艺术手法完美配合,砖塔形式美观华丽,散发出浓郁的地方与民族气息,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瑰宝。辽代砖塔既对后期中国塔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是对辽代建筑扩展研究的实物载体。

目 录

上篇 辽代砖塔的建筑艺术

第一章 辽塔概况	3
第一节 中国塔与辽塔的发展	3
第二节 辽代的宗教与塔	6
第三节 现存辽塔的数量和分布	17
第四节 辽塔形制的演变发展	30
第二章 辽代砖塔的平面布局体系	35
第一节 塔城相伴	35
第二节 塔寺同存	38
第三节 多塔与双塔	43
第三章 辽代砖塔的造型艺术	46
第一节 辽代砖塔的艺术形态	46
第二节 辽代砖塔各部构成的形式与内涵	51
第三节 辽代砖塔的形态构成	61
第四节 辽代砖塔的用材与模数制度	64
第四章 辽代砖塔的装饰艺术	79
第一节 佛塔装饰的起源与发展	79
第二节 辽塔装饰的分布特点	80
第三节 辽塔装饰内容	82
第四节 辽塔装饰的表现手法	110

下篇 辽代砖塔的营造技术

第五章 辽代砖塔的施工方式及工艺	121
第一节 出资与建造的发起	121
第二节 施工组织及工匠	122



第三节 施工脚手架.....	129
第四节 施工建造顺序及时间控制.....	133
第六章 辽代砖塔的建筑材料.....	135
第一节 砖料.....	135
第二节 木构件.....	152
第三节 瓦件.....	156
第四节 灰浆.....	157
第七章 辽代砖塔的构造做法.....	162
第一节 地宫、中宫和天宫	162
第二节 塔基.....	167
第三节 塔身.....	181
第四节 铺作.....	198
第五节 塔檐.....	216
第六节 塔心室.....	221
第八章 辽代砖塔与其他时期砖塔营造特点的比较.....	225
第一节 辽塔与隋唐五代佛塔营造特点比较.....	226
第二节 辽塔与北宋佛塔营造特点比较.....	228
第三节 辽塔与金塔的辨别.....	231
第四节 辽代砖塔营造技术的特殊性成因分析.....	240
参考文献.....	245

上篇

辽代砖塔的建筑艺术

第一章 辽塔概况

第一节 中国塔与辽塔的发展

塔,在建筑类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国的塔尤为突出。中国塔早期虽源于印度,但在发展和传承过程中却表现出强烈的本土特色——将“重楼”与“窣堵坡”十分巧妙地结合起来。从云岗、龙门、响堂山等石窟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的塔多为木构楼阁,方形,冠以窣堵坡,即为塔刹。由于木塔在防火、防潮、防蛀等抗拒自然破坏力方面的优越性远不及砖石塔,因此砖石塔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和推崇。除了应县木塔为唯一保留至今的木塔遗构之外,中国现存的塔全部为砖石结构或是砖木混合结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朝代的更迭,中国的塔经历了形制、材料、营造技术的转变和发展,呈现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所独有的特征,千变万化,精彩绝伦,彰显出中华民族伟大的才能与智慧。

一、中国塔的发展

砖石塔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古拙时期,即方形时期(公元 500—900 年);繁丽时期,即八角形塔时期(公元 1000—1300 年);杂变时期(公元 1280—1912 年)。

古拙时期,我国的塔以方形平面居多,结构形式以空心单筒塔最为典型,塔的造型古朴、简洁,没有过多的装饰。繁丽时期,塔的典型特征是平面为八角形;建筑形式较唐代以前华丽许多,塔的整体比例协调适中,塔身的装饰以木构构件为原型,极力效仿;结构形式采用了塔内用砖石砌出横向和竖向的间隔,以形成回廊和楼梯。杂变时期,从元朝开始,由于民族、区域和时代等因素的影响,塔的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喇嘛塔和金刚宝座塔大为流行,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保佑科举考试好运的文峰塔。

(一) 唐代以前

唐代以前,我国的塔以方形平面居多,结构形式以空心单筒塔最为典型,常有砖壁木楼层塔身。基本形制可分为单层塔、多层塔和密檐式塔。塔的造型古朴、简洁,没有过多的装饰,这与唐代以前的木构建筑或有一些相似之处。



在这一时期,单层塔比较多,且大多为墓塔,规模不大,平面一般为方形,一面设有拱门,屋顶为一至两层的屋檐,上设塔刹。建于贞观年间的山东省长清县灵岩寺慧崇禅师塔为单层方塔,是这一时期单层塔的代表。

比较著名的多层塔是陕西省西安市慈恩寺大雁塔,其平面为方形,结构形式为空心单筒式,砖塔内部采用了木制楼板、楼梯,塔身各面砌出瘦长的扁柱,柱头设有一栌斗,无补间铺作,四面开有券门。

这一时期的典型密檐式塔都为方形,一般不设台基,一层塔身墙面不设装饰,素面。建于公元8世纪早期的河南省登封市嵩山永泰寺塔为方形密檐式塔,是这一类型塔的最好实例。

当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上述类型的塔,如建于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的神通寺四门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塔,它是方形单层亭状石砌建筑,中央设有方形塔心柱,塔的四面贯通,与空心单筒塔不同。当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多边形塔,如河南省登封市嵩山会善寺净藏禅师塔是一座单层八角形亭式砖砌建筑。建于北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的河南省登封市嵩山嵩岳寺塔,其平面为十二边形,十五层密檐。

(二) 五代、两宋和辽金时期

五代、两宋和辽金时期,塔的典型特征是平面为八角形,结构形式采用了塔内用砖石砌出横向和竖向的间隔,以形成回廊和楼梯。虽然这一时期也有少量的方塔,但不过是在塔的外观形式上保留了唐塔的风韵,而其内部或是实心结构或是设置绕中心方室盘旋而上的通道和楼梯。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塔的形式较唐以前华丽许多,塔身的装饰繁多,以木构构件为原型,极力效仿。

曾经风行一时的单层塔到了唐末以后已日趋罕见,多层塔和密檐式塔也发生了变化。八角形的平面成了常规,而方形塔却寥寥无几。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一时期盛行八角形塔,但现存最早的八角塔却是建于唐天宝年间的河南省登封市嵩山会善寺净藏禅师塔。

这一时期多层塔的内部不再是空心单筒结构,塔内常用砖石砌出横向和竖向的间隔,以形成可盘绕而上的走廊和楼梯。当然,伴随着匠师建造技艺的提高,走廊和楼梯也变得越来越宽,以致后来形成了一个类似由砖砌塔心和筒体所组成的建筑,整个塔身日趋轻巧。这一时期的多层塔可以分为仿木式和无柱式,仿木式又可分为北宗辽式和南宗宋式,北宗辽式以河北省涿州市云居寺南北塔为代表,南宗宋式以浙江省杭州市闸口白塔为代表,二者都以仿真的木构形式而见长,令人赞叹。不同的是,前者塔体粗壮,后者塔体纤细,当与地域、气候条件有关。无柱式主要是北宋形制,其特点是立面不用倚柱,檐下常用斗拱或是砖砌叠涩,山东省长清县灵岩寺辟支塔就属于这种无柱式塔的实例。



唐以后,密檐式塔是辽金时期使用最多的一种形式,也是华北、东北地区现存最为常见的塔的形式。这一类塔以八角形居多,实心砌筑,不能登临。通常塔身坐落于塔台之上,由须弥座承托,须弥座多为双层。一层塔身通常较为高大,其与须弥座之间常设莲台,二层以上塔身高度骤然降低。各层塔檐或以斗拱承托或是叠涩出檐,如果两种方法并用,则一层塔檐施用仿木构形式的砖构斗拱,以上各檐叠涩出檐。建于辽代的辽宁省的辽阳白塔和锦州大广济寺塔、北京天宁寺塔当属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

这一时期的密檐式塔也保留了部分唐以前的某些建筑风格,但在结构上却拥有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如建于辽代的朝阳青峰塔从平面形式上看保留了唐以前的方形平面,但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其须弥座和一层塔身部分是空心的塔心室,而二层塔檐以上则为实心。建于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的河南洛阳白马寺塔,是一座实心方形平面塔。建于宋崇宁、大观年间(公元1102—1109年)的四川省宜宾市旧州坝白塔的外观虽也保留了唐塔的建筑风格,但其内部却是通道和楼梯绕中心方室盘旋而上,具有这一时期典型的结构特征。

经幢也是盛行于这一时期的佛教纪念性建筑物,这类建筑物常以石制而成,外观形式也各有不同,可视为塔的一种特殊类型。

(三) 元、明、清

从元朝开始,蒙古族入驻中原,喇嘛教开始流传。受到宗教的影响,塔的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藏化的印度窣堵坡式塔开始大为流行,明代的金刚宝座塔是这一时期塔的主要类型。在这一时期,造塔不再纯为佛事,而是出现了许多保佑科举考试好运的文峰塔。塔的种类增多,形式也多样,中国塔开始进入杂变时期。

这一时期,多层塔的塔身更加修长,塔身较少卷杀,基本为直线收分,塔檐出檐小,斗拱体型变得纤细。塔的外观比例不如五代、两宋和辽金时期的优美,同时常有一些新奇的组合和变体。如建于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的山西省临汾市大云寺塔,共五层,下面四层为方形平面,最上一层为八角形平面。同时塔的内部结构虽也以实心砖墩为中心,周围环绕楼梯,但常有不尽合理之处,如建于明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的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飞虹塔,其内部的楼梯不但狭窄,而且无一处可休息的平台。

密檐式塔在外部形式上大体保留了辽金时期的做法,但细节的处理发生了变化,如采用了拱券式窗和双层额枋,斗拱体量变小等。这类塔以建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北京市八里庄慈寿寺塔为典型代表。密檐式塔的结构也不完全为实心,如河南省安阳市天宁寺塔底层内室四周设有楼梯,而上层则为筒状结构,与唐塔相似。

现存最早的喇嘛塔的原型可以说是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的半球形墓塔,直到



元代,这种雄伟的建筑形式才开始大放异彩,这与喇嘛教的流行自然不无关系。这一时期的喇嘛塔是一个瓶状建筑,建于高台之上,台基施用须弥座,肥硕的塔肚之上是十三相轮,塔刹冠以宝盖。比较著名的喇嘛塔当属建于元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的北京市妙应寺白塔和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山西省五台山塔院寺塔。

现存最早的金刚宝座塔可追溯至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诸塔。此后也有这类塔的出现,如建于唐中叶山东省历城县柳埠村的九塔寺塔、金代河北省正定县的花(华)塔等。明代正式确立了金刚宝座塔的形制,五塔筑于同一台基之上。如建于明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的北京市大正觉寺的金刚宝座塔和建于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的北京市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

二、辽塔的发展

辽塔的发展正处于中国塔发展的繁丽时期,即八角形塔时期(公元1000—1300年)。这一时期,塔的典型特征是八角形的平面成了常规,而方形塔却寥寥无几。塔身的建筑形式较唐以前华丽许多,塔檐、塔身等细节的装饰常以木构构件为原型,极力效仿。结构形式采用了塔内用砖石砌出横向和竖向的间隔,以形成回廊和楼梯,或是做成实心。

虽然辽代佛殿建筑以雄伟、朴实为主,结构完整,不尚华饰,但辽塔却形式繁多,手法细腻、娴熟,以装饰华丽、结构简练、雕琢细腻和逼真的仿木形式见长,具有强烈的标准样式,时代特征和地域特性十分鲜明。辽塔高大的体量、八角形的平面、实心结构或是砖石塔心柱塔身结构等都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的共同特征,同时其须弥座的台基、高大的一层塔身、层层密檐及细腻的雕琢和逼真的仿木形式又可视作辽塔的个别特征。在结构形式上,辽代的砖塔除了承接古朴时期的筒体结构之外,还存在着这一时期典型的中心柱形式,其内部楼板有木构楼板也有砖砌楼板,是木构向砖构的过渡与反映,河北省涿州市的云居寺塔、辽宁省阜新市的东塔山塔、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都属于这一类。这一时期的塔以实心居多,比较特殊的是出现了实心与筒体相结合的形式,即各个塔室呈封闭空间,互不相通,此类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庆州白塔最为典型。

这些特征使得辽塔既在中国塔的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繁丽时期的重要代表,同时又具有十分明显的个性特征。

第二节 辽代的宗教与塔

辽人既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又有因汉人带来的佛教、道教的宗教信仰。其



中,佛教在辽代,尤其是辽代中后期最为盛行,这与统治阶级的积极倡导不无关系。辽代中后期,辽国境内大量修建寺院与佛塔,因此寺院经济成为了辽朝重要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一。如今辽宁省、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等地仍矗立着大大小小、建造精美的辽代砖塔,那些体型巨大者一般由皇室成员或贵族参与修建,而那些小巧精美者则常常由百姓筹资献力修建,由此不难看出佛教对辽朝整个社会的影响之深。

一、辽代的宗教信仰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称汗,初定国号“契丹”,后改国号为“辽”。契丹人的巫术信仰、自然崇拜、佛教、儒教和道教一直并存,前两者信仰与其游牧民族的身份不无关系,后三者信仰与其统治者的政策倡导紧密相关。

(一) 佛教

五代后期,辽上京就曾见有僧、尼,由于辽上京地区有大量汉人,因此自辽初以来,佛教就已传入辽朝境内。辽朝境内蕃汉各族普遍信仰佛教,这与统治阶级的倡导是有直接关系的。辽圣宗时期,承天太后“每岁正月辄不食荤茹,大修斋会及造寺,冀复获福祐”^[1]。而辽圣宗本人也十分崇信佛教和道教,其汉文化的修养很高。辽兴宗也迷信佛教,并到了穷途极侈的程度。辽道宗更是拥有相当的佛学修养,每年夏季,他都与诸僧徒及群臣举行法会,并执经亲讲。

辽代佛教的盛行远胜于同一时期的北宋,可以说佛学是辽朝重要的精神支柱。尤其到了辽代的中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佛教成为控制百姓的重要精神工具,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在公元10—12世纪,辽代有许多著名的高僧活跃于东亚的佛教文化圈之中。同时,许多汉人高僧也因饱读佛教经书而得到辽朝廷的重用,仕途顺畅,这更加促进了辽代佛学的发展。从民族上说,契丹是处于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游牧民族,其原始宗教为萨满教。由于萨满教的理论贫乏,且契丹民族的文化沉淀远远不及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因此,佛教的传入给整个辽朝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在辽代,佛教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直至占据国家精神文化的制高点。

辽代的皇室人员常常亲自参与支持佛教的发展。由于皇室权贵的支持、施舍,辽代的寺院经济特别发达。如辽圣宗次女秦越大长公主舍南京(析津府,亦称燕京,今北京市)私宅,建大昊天寺,同时施田百顷,民户百家。民间对于寺院佛事,也时常发起团体性的支持,盛行着所谓“千人邑社”的组织。整个辽朝社会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都十分热衷各种助佛活动。

[1] 参见清徐松著《宋会要辑稿·蕃夷一》。



佛学占据着整个辽代社会文化的精神层面,是辽朝的精神支柱,整个社会都虔诚信佛。正是在统治阶级崇佛政策的推动下,寺院、佛塔的营建活动十分盛行。佛寺成为社会的文化中心,寺院向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开放,这里不仅有关于佛学造詣的学术研究,也有面向大众的通俗教育。寺院既承担着对佛教教化、传播和普及的作用,又承担着大众文化教育的主要功能。

佛教不仅成为辽朝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还深入到了百姓的家庭生活之中。在辽代,剃度出家较为盛行,同时居家诵经、念佛立幢的现象也比较普遍,甚至连名字也常常用以佛号。凡是一些重大的活动或是节日,也会遵循佛诞的规定和风俗。但到了辽道宗时期,僧、尼多达十万之众,不劳而食,成为社会的公害。

(二) 儒教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确立了儒教为先的原则,将孔子置于至尊的位置。从“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1]可看出,三教的先后顺序十分明确。辽兴宗时,受到儒家及汉文化的影响,知书孝礼已经风尚化了,契丹人积极努力汉化,释儒之学成为儿童受教育的内容。辽兴宗时期的汉臣马保忠曾上书时说,“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2],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愿望。辽道宗即位元年,“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形成了崇释容儒的历史时期。

但儒教始终没有在辽朝社会形成主流,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因为辽代尊儒只是在寻找一个尊者,而非接受儒家思想的全部。如若将儒家与帝制看成一体,儒生必将受到重视,而英勇善战的契丹贵族将不会得到重用,这必然触犯了其阶级利益。因此,在辽代后期,随着汉化进程的加快,儒教才逐渐占据上风,但达到顶峰时,辽朝已是“黄昏夕阳”了。

(三) 道教

对于道教,契丹统治者也曾提倡,“初,真定苏澄善养生,为道士,居隆兴观。唐、晋间数被召,皆辞疾不赴。契丹主凡欲自立时,求僧道之有名称者加以爵命。惟澄不受”^[3]。辽圣宗在重视佛教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道教,他“释道二教,通其旨”。但道教始终不能与佛教相提并论,这大概是因为道教的无为思想与契丹的扩展斗习不能相容。

(四) 契丹的原始宗教

契丹有拜日的原始宗教。辽天赞三年(公元924年)六月,耶律阿保机“大举征

[1] 参见元脱脱等著《辽史》卷一,《本纪第一·太祖上》。

[2] 参见陈述辑校《全辽文》卷七。

[3] 参见宋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开宝二年》。



吐浑、党项、阻卜等部。昭皇太子监国……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庚子，拜日于蹕林”^[1]。宋人诗歌对契丹人拜日也有所反映。刘攽有两首诗歌都言及了契丹人拜日，其中一首云：“饮冰重见古人心，绝幕仍当暮雪深。朝出穹庐随拜日，夜鸣刁斗候横参。胡儿射雁争娱客，羌女听笳却走林。闻说虏情亲博望，一言珍重万黄金”^[2]”。因为契丹人对太阳的崇拜，其殿帐也是置于东向的。

契丹的另一个原始宗教是巫术，这种对原始宗教的崇拜表现在很多地方。例如，大同元年（公元947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攻入开封城，他安排契丹士兵把守都城及宫城诸门，又在各个城门屠杀猎狗，并在宫廷中用竹竿高悬羊皮，用此巫术来驱除一切不祥。又如，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四月十六日，“次于栾城县杀虎林之侧，时德光已得寒热疾数日矣，命部人赍酒脯，祷于得疾之地。十八日晡时，有大星落于穹庐之前，若迸火而散。德光见之，西望而唾，连呼曰：‘刘知远灭，刘知远灭！’是月二十一日卒”^[3]。

二、辽塔与佛教文化的关系

塔是辽代社会崇佛的重要体现，与辽代的佛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辽代常以国力投入修塔造寺之事，例如，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朝阳北塔在辽代的两次修葺都倾入了大量的国力、国资，尤其是辽兴宗重熙年间的第二次修葺，规模大，范围广，从下至上几乎都重新砌筑了一遍。可见，塔在辽代社会文化生活中既是精神的依托，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

（一）塔在辽代社会中的地位

辽代将佛教与国家体制相提并论，并使其凌驾于国家之上，朝阳北塔的“南阎浮提大契丹国”之载，使我们对辽代的崇佛程度有了新的认识。辽朝在吸收中原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大加应用，而且出于统治阶层的政治需要，还大力提倡佛教，崇佛之风日盛，乃至达到炽烈的佞佛程度。

据佛教经典，塔是保存或埋葬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舍利的建筑物。舍利是佛教中至高无上的神圣物品，是佛教徒顶礼膜拜的对象。为了供奉和保存舍利，“塔”这种纪念性的建筑便应运而生。佛教的传播，一是利用佛经来说教；二是以形象化的实物或图画来宣传，佛像、佛塔就是最突出的形象。

塔的梵文是“坟冢”，在传入中国之前，印度的塔已经历了较长的发展时期。印度的塔有两种：一种是埋藏佛舍利、佛骨等的“窣堵坡”，具有坟冢的性质；另一种是

[1] 参见元脱脱等著《辽史》卷二，《本纪第二 太祖下》。

[2] 参见北宋刘攽撰《彭城集》卷十三，《次韵和张舍人使北归》。

[3] 参见北宋薛居正等编《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外国列传一》。



所谓的“支提”或“制底”，内无舍利，称作庙，即所谓塔庙。这两种形式的塔传入我国，与我国固有的建筑形式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后，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窣堵坡”原本是一个半圆形的冢，与我国原有的木构建筑相结合便衍生出各种形式的塔来，成为中国佛塔的主流。而“支提”传入我国则发展成为石窟寺，在中国佛塔的发展中并未占据主流的位置。

我国的塔有单层塔、多层塔、密檐式塔、喇嘛塔、金刚宝座塔等形式，不同形式的塔内部结构不同，同一形式的塔因所处的年代不同，其内部结构也有所不同，这当然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分不开的。

从平面布局来看，辽代的佛塔有多塔、双塔的布置形式；按其形制来分，有楼阁式塔、密檐式塔、花（华）塔和覆钵组合式塔等；以塔身平面为分类依据，有方形塔、六边形塔、八边形塔；根据塔的功能意义，可分为舍利塔、发愿塔、墓塔等。

（二）辽塔体现的佛学文化

辽塔常常体现各种佛教教义，是辽代佛学文化的反映。如八大灵塔体现了世尊一代之八处灵迹，有些辽塔塔身雕刻着五方佛，有些辽塔塔身雕刻着《法华经》，还有些辽塔体现了佛教的宗派之别。

《佛说造塔功德经》载：“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辽塔塔身常雕有这四句偈语，如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塔身和河北省涿州市云居寺北塔下层基座均雕刻了这四句经文。

《大智度论》卷第十一中《释初品中舍利弗因缘第十六》载：“禅理玄机——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吾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根据赵朴初先生在《佛教常识问答》中所述，古代佛塔一般都刻着这首偈当作舍利供奉，因为佛说过“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所以这首偈被称为法身舍利偈，这也表明了缘起教义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北京市灵光寺招仙塔现仅存塔基的第一层底座的砖面上雕有这首佛教起源偈。

《大般涅槃经》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四句偈语是佛教小乘解脱道的妙理。兴城白塔峪塔塔身四隅面就分别以这四句作为雕刻铭文：东南面——寂灭为乐；西南面——诸行无常；东北面——生灭无已；西北面——是生灭法（见图 1-1）。

有关佛塔的记载，除八王均分舍利所建的舍利塔外，还有为供养佛发而立的发塔、供养佛陀指甲及足趾的爪塔、供养佛牙的牙塔，以及衣塔、锡塔、瓶塔等。此外，佛陀住世时，曾对弟子称扬八大灵塔，说明如果有人发大信心修建八大灵塔，承事供养，是人可得广大利益，获大果报，善名美誉流传后世。

八大灵塔，是指建立于佛陀的八处圣迹大塔，略作八塔。八塔名称并不统一，若依《佛说八大灵塔名号经》所载，分别为：佛生处，迦毗罗城龙弥憍园；佛证道果处，摩伽陀国泥连河边菩提树下；转大法轮处，迦尸国波罗柰城；现大神通处，舍卫